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赵中源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也是贯穿我们党伟大奋斗历程的鲜明主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是开展经济建设的重要立场,也是开展社会建设的重要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其重大意义、基本要求和重点任务,为新发展阶段进一步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切实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提供了根本遵循。

保障民生重在守住兜牢民生底线

坚持底线思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科学方法论,强调把握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有机统一,重点在于居安思危,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民生底线是民生建设的起点线。一般而言,民生底线是指政府根据特定区域和特定发展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保障人民群众生活需求所设立的基础性、托底性制度安排,核心在于通过社会救助和基本公共服务确保人民群众在温饱、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基本权益。民生底线是动态发展的,伴随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趋高。因此,新发展阶段的民生底线,还应包括政府民生建设目标及其实现效果不打折、不缩水,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既有的整体生活水平并持续向好等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扎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面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等重要论述,为新发展阶段守住兜牢民生底线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工作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和关键性工程。立足当下,要深刻把握民生建设的新情况、新特点、新要求,继续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更好满足经济困难群体的民生需求,这既是加强兜底性民生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各级党委政府的责任底线。持续关注解决好暂时生活困难群体的民生需求,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的老年人、残疾人及未成年人提供生活保障。持续关注劳动能力不足的低收入群体的民生需求,为缺乏劳动技能、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社会成员提供生活保障。持续关注和解决好暂时生活困难群体的民生需求,尤其要关注就业困难遭遇挫折的青年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需要指出的是,基本生活保障是一个发展着的范畴,是匹配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条件设定,而非简单的生存

基本需求,包含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保障、基本教育保障和基本住房保障等内涵。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2025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成为当前守住兜牢民生底线的突出任务。要围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要求,按照巩固、升级、盘活、调整的发展思路,分类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增效,特别是针对易返贫致贫的关键领域和重点群体,深入开展“组团式”帮扶与提升自身“造血”功能相统一的支持计划。聚焦产业富民,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更好推动共同富裕,切实从源头上防止返贫致贫。与此同时,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多重困难挑战,尽快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抓好各项民生实事和民心工程,着力提高公共服务均衡化、优质化水平,也是现阶段筑牢民生安全防护堤的重要议题。

改善民生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改善民生是基于保障民生之上的更高要求,是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深刻阐明了新发展阶段改善民生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

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收入是民生之源。收入分配制度是改善民生和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部署要求,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制度体系。

进一步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就业是民生之本。按照更加均衡可及、普惠便捷、标准规范、优质高效的总体要求,完善高水平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是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关键环节。在强化制度保障层面,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事项清单,明确政府兜底保障范围与服务标准,以服务程序化、管理规范化,促进服务质量标准化。在夯实基础支持层面,将促进就业工作纳入基层治理范畴,坚持服务向基层延伸、资源向基层下沉,优化基层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整合公共就业服务设施布局 and 共建共享。在充分发挥党委和政府的协调引领作用,统筹整合区域内

府、高校、企业、社会广泛协同的多元化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在提升服务效能层面,加快数字技术赋能增效,提升就业公共服务的智能化水平,更好实现就业市场供需有效对接,促进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把重点放在完善教育、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上,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要切实加大教育投入,确保教育资源均衡分配,特别是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和边远地区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差距。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体系,提升教育整体质量,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打好基础。要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健全法律制度和相关政策支持,保护和激励老年人奉献才干、服务社会的积极性,更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要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积极应对我国人口结构、就业方式变化等对医疗保险需求的变化,在持续巩固全民参保成果的基础上,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有序衔接,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夯实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根基。

进一步深化社会治理体系改革。现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些都对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强化社会服务的同时,要推动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激发全社会共同奋斗的热情,打造形成多元参与、充满活力、高效有序的社会治理新局面。

促进经济发展与民生建设良性互动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促进经济发展与民生建设的有效对接和良性互动。在生产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具有基础性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由利益关系所决定的。利益配置越合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和谐,社会发展的共识与合力越汇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深刻把握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互动的核心要义、价值意蕴与实践要求,更好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其一,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是高质量发展的显著特征。检验高质量发展的标准归根到底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更高效的提高来实现。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条件和边际产出发生改变,已经不可能单纯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而必须转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创新的一个重要主体是劳动者。因此,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成为形成发展新动能的内在要求。更公平的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追求,是最大限度汇聚社会发展共识与合力的关键所在。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做大做好社会财富“蛋糕”的同时,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合理协调三次分配制度。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的是推动民生幸福指数持续提升。

其二,深刻把握新发展理念的价值追求。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在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具体的、现实的,强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惠及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与要求,但其价值指向始终聚焦提高民生福祉、推进共同富裕这一命题。要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重用民主的方式、依靠法治的力量,进一步完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特别是注重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等涉及民生福祉的改革,以保障人民群众合理、公平地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其三,深刻把握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方法论要求。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是把握和遵循发展规律的一种体现,蕴含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尽力而为,强调党和政府的责任担当和主动作为,意味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做好民生工作。量力而行,强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谋划和实施民生建设的目标与举措。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民生建设的各项工作,通过落实每一项惠民之举、利民之事,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现阶段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在把握和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同时,“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作者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质生产力为何是绿色生产力

史守林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论断强调了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揭示了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内在关联,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路径。那么,为什么说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新”和“绿”有何寓意,绿色转型发展的着力点又在哪?

所谓“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意指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新质生产力是具有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摒弃了传统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强调通过科技创新、模式创新、制度创新等途径,引领生产力要素实现绿色化革新和优化组合,构建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气候友好的发展体系,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高效率、更可持续的新动能。这不仅符合绿色发展理念,也开辟了生产力发展的绿色新路径。

具体来说,正确认识和理解“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需从三个维度入手。首先,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涵盖了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内蕴绿色意蕴。传统生产力突出人对自然的控制,却忽视自然对人类的制约。而新质生产力理论将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纳入生产力范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其次,从现实来看,新质生产力能够促进生产力的绿色化跃迁与绿色低碳发展。过去,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环境问题日渐突出。现在,各地都在转变发展理念,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走绿色发展之路,实现经济的“含金量”与“含绿量”高度契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再次,从价值目标看,发展新质生产力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既关注人的主体价值,又秉持生态属性,摒弃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突出强调“新”和“绿”两个特质。

所谓“新”,一是指“新技术”,涵盖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等。当前,颠覆性技术的创新突破已成为推动未来产业等发展的核心动力。例如,量子的崛起源于量子技术的突破,人工智能产业的兴起同样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重大进步。二是指“新产业”,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例如,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作为绿色产业链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绿色转型注入了新活力,正推动整个产业体系朝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发展。三是指“新模式”,主要表现为数字化和智能化生产模式。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新模式下的产业链内部和产业链之间能够形成信息共享与协同。四是指“新动能”,包括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其核心在于创新,通过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促进绿色低碳产业发展,进而推动新业态和新模式的不断涌现。

所谓“绿”,首先是绿色技术。绿色技术创新是促进绿色化、智能化发展的关键变量,其核心是绿色、循环、低碳,不仅为节能技术改造、绿色产品研发提供了新空间,还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优化要素配置、降低资源能源消耗提供了新路径。今年,浙江借助数智技术赋能,将加快传统产业“智改数转”,持续推动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业重点技改项目5000项以上,就是很好的例证。其次是绿色能源。绿色能源包括核能、风能、水能、地热能、氢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呈现出循环再生性新质态。例如,内蒙古在提升煤制烯烃产能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助推当地能源转型与绿色低碳发展。再次是绿色产业。聚焦实体经济发展,做强绿色制造业,从源头解决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从而倍增生态经济效益。最后是绿色消费。促进生态环境效益与消费需求有机结合,推出更多满足消费需求的绿色产品和服务,激发绿色消费内生动力。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告诉我们,要把握好二者之间的联接点,抓住“新”与“绿”两个关键,切实转变传统的线性增长、高碳增长方式,树牢绿色发展理念,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

一方面,坚持创新为本,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当前,推动绿色科技创新的原创性技术较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不足。需组织开展绿色科技攻关,强化低碳发展、资源节约、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等关键领域技术攻关,加强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的融合,着力突破一批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全面提升绿色科技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坚持制度为基,强化制度体系保障。随着我国持续深入推进绿色发展,经济社会各领域都需深化改革。绿色发展是目标,政策标准是保障。应与时俱进优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配套规章和实施细则及时查漏补缺,筑牢制度护绿的基石。比如,在鼓励绿色技术创新的制度方面,应细化创新标准和认证程序,推动其在各行业的应用和发展;在绿色激励制度方面,应通过税费优惠、政府补贴等激励措施提高企业绿色转型的积极性,引导全社会形成更加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

(作者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宁波大学基地研究员)

加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文化支撑

李扬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进程的产物,是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金融篇的重要内容,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以金融服务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在《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篇著作对此作出深刻阐释,并指出“我们要坚定信心,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完善,使这条路越走越宽广”。

坚定信心,离不开发挥文化的作用。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需要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和丰厚滋养。

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要坚持诚实守信。人无信不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重信守诺、诚实守信。信用也是金融业的核心要素之一。金融业中的所有产品和活动,例如货币、债券、股票、投资、储蓄等,都是基于信用产生和发展的。从信用的角度来看,金融就是授信人在充分信任受信人能够实现其承诺的基础上,根据双方订立的契约向受信人放贷(实物或货币),同时保障放贷人的本金能够回流并有所增值的价值运动。因此如此,提升金融体系效率,一个重要方面就

是降低资金供需双方建立信任的成本。

恪守市场规则和职业操守,将诚实守信融入金融各项业务中,不仅有助于直接降低资金供需双方的信任成本,提升金融市场流动性和效率,还可以间接降低监管成本,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应当看到,信用发展需要载体,契约就是这种载体。夯实诚信基础、维护契约关系,离不开良好的法治体系。为此,要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法律法规制度,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促进形成良好社会信用环境。

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金融具有功能性和盈利性双重属性,不能单纯以盈利性为目标,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平衡功能性和盈利性的关系。过去一段时间,我国金融业发生了一些乱象,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践行正确的义利观。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必须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创造价值和利润,实现经济与金融共生共荣,不能唯利是图。要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增强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普惠性、可及性,让金融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

着眼于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金融系统要着力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文章。应当看到,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要么不能直接产生明显经济效益并不显著。因此,做好这“五篇文章”必须坚持以义取利,扎根于为实体经济服务、适应消费者和投资者需要进行金融创新,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总的来看,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立足我国国情,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创新之路。坚定信心,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不仅要加强现代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等“硬实力”建设,也要促进价值观、行为规范等“软实力”提升。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将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夯实文化之基、铸牢文化之魂。锚定建设金融强国目标,保持战略定力,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久久为功、善作善成,我们一定能推动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方法论 准确把握错位发展、串珠成链

董雪兵

县域的发展水平和治理能效,关乎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重大战略的实施,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这一重要指示为各地区立足自身实际,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

县域是承上启下、沟通条块、连接城乡的枢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各县域在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条件、文化传承、生态功能等方面存在差异,是形成独特比较优势的客观基础,决定了其必须立足自身实际,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道路。近年来,从陕西西柞乡的“小木耳”变成“金耳朵”,到浙江乐清深耕水产产业集群,各地涌现的“一县一业”“一乡一特”生动实践,正是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实现错位发展的鲜活案例。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县域经济发展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有的县域特色产业元素体现不突出,照抄照搬现象比较普遍;有的县域产业链条较短、层次不高,价值创造能力有待提升;中西部地区一些县域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内生发展动力亟待增强;等等。“错位发展、串珠成链”,正是在深刻洞察县域发展实际的基础上提出的,要求各县域立足差异与比较优势,科学研判自身功能定位与主攻方向,从

而精准施策、扬长补短,破解难题、塑造新优势。

“错位发展”的关键在于精准把握并充分发挥县域的比较优势,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对于县域而言,“错位”首先必须深深植根于自身的“家底”,即独特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条件等“显性优势”以及文化积淀、生态环境、营商环境、社会治理效能等“隐性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土特产”文章,正是表明要善于发掘和利用这种基于本土禀赋的比较优势,形成“人无我有”的独特起点。同时,随着技术进步、市场变化和发展阶段的演进,过去的优势可能减弱,新的机遇窗口不断过去。因此,“错位发展”更需秉持发展眼光和创新思维,不仅要立足当前“有什么”,更要前瞻性谋划“能发展什么”“应发展什么”,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区域发展格局,城市功能疏解、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和市场前沿,积极培育“人有我优、人优我强、人强我新”的动态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将潜在优势有效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与市场效益。比如,农业大县可对接城市居民对高品质、特色化农产品的需求,发展精深加工和品牌农业;工业强县可瞄准产业链升级方向,推动工业融入区域价值链;等等。

“串珠成链”是运用系统思维,将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珍珠”(县域特色产业)有效串联、协同整合,形成价值倍增的“项链”(区域产业集群或经济带),将

分散的比较优势凝聚为区域整体竞争优势。现代经济竞争呼唤协同,高效发挥比较优势必然要求突破行政区划藩篱和市场分割壁垒,在更广阔空间实现要素自由流动、资源优化配置、产业深度分工与协作。构建跨区域、跨区域的经济联系网络和发展共同体,既依赖于交通、物流、信息等基础设施“硬联通”打通物理脉络,也要靠协作机制、统一市场、营商环境等“软环境”提供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引导县域产业向纵深拓展,推动价值链延伸、供应链稳固、创新链激活,并着力培育“链主”企业引领、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产业生态。“串珠成链”将分散的县域力量汇聚为区域整体合力,实现从“单打独斗”到“集群作战”的转变,能够有效破解“低端锁定”,提升整体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为县域乃至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续的动力。

当前,县域“错位发展、串珠成链”的一个关键方向是从要素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发展。为此,必须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高效引导创新要素,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战略引导、优化营商环境,并着力破除区域壁垒与体制障碍,为要素顺畅流动与高效协同铺路搭桥。

(作者为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